



# 布包里的粉笔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

木坪村是石柱土族自治县龙潭乡的一个高海拔村落,这里的人们喜欢把老师(lao shi)读音叫成“lao si”。这种叫法,陈天玖老师听了43年。

1965年,他17岁,生产队让他在石干坪那栋漏雨的木楼里管27个娃。队里每天给他记工分九分五,折现一块零六分。他搬来一块山里的青石板,用镰刀敲平,当黑板;又把苞谷秆编成算珠,教“一加一”。夜里,他点亮煤油灯,给白天薅草的大人读《人民日报》。灯芯烧短后,他拿火柴棍挑,火星子落在袖口,烧出一个小洞。此后,那件蓝布褂子一直有一个铜钱大的补疤,像一枚别在袖子上的徽章。

1968年,公社调他去“驻队”,任务是教社员认“碳酸氢铵”四个字。他索性把课堂搬到打谷场,用糞耙在泥地上写:“碳——左边是石,右边是炭,黑不溜秋能烧火。”妇女们笑得前仰后合,笑声把拴在场边的黄牛都惊得擤了一个响鼻。

此后20年,他辗转7所村小,像一

粒被山风抛撒的种子,在哪儿都能生根。1989年,他最后一站落脚木坪,从此再没挪窝。

2006年,我毕业分到木坪村完小,第一次看见他。见我下车,他热情地问候:“你就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老师?我代表学校和个人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。”我伸出手,笑着回答:“很高兴认识你,陈老师。”他先是一愣,然后笑着帮我提行李。进入校园,整个操场一片狼藉。他把我带到他的临时寝室,与其说是寝室,不如说是用木板拼成的地铺。学校正在修建校舍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然后我就收拾一下住的地方,他被人喊出去了。等我收拾好出去,只见到到处都是砖、稀泥、钢材。他正蹲在工地边,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写“高粱”的“梁”,写完抬头冲我笑,露出一排黑牙。

“陈老师?如果你不嫌弃,晚上就住我家,这里有诸多不便,省得蚊子咬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道:“给您添麻烦了!”

他摆摆手,指了指远处的矮山:“那边是梔子林,我们叫‘离子林’,花开时,娃们摘来别在衣扣上,能香一路。”接着起身,只见蓝布褂子后背湿成深色,像一张旧地图。

夜里我睡他家阁楼,楼板薄,翻身就“咯吱”响。他抱来一床晒过太阳的棉被,带着一股柴火味。“放心滚,掉不下去。”“有什么事就喊我,我在隔壁。”

灯熄后,我听见他在隔壁咳嗽,一声接一声,像要把肺也咳出来。月光从瓦缝漏进来,落在被面上,像撒了一把碎米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我就吃住在他家。

有一次我上课,把“庄稼”读成“zhu ā ng jì à”。他推门进来,声音如炸雷:“念‘zhu ā ng jia’,轻声!庄稼人把‘稼’读重了,牛都笑!”

全班哄笑,我耳根烧得发烫。下课后,他把我叫到厨房旁用山泉水洗粉笔盒,水冷得扎手。

“教娃儿,先得让娃儿笑你。笑完再学,一辈子不忘。”

说罢,他把盒子往我怀里一塞,水溅了我一身,像给我打烙印。

10年后,我在黄鹤小学教一年级,读到“庄稼”一词,故意

把“稼”字念得山响,娃们哄堂大笑,我学着陈老师当年的腔调:“庄稼人把‘稼’读重了,牛都笑!”

笑声里,我听见山泉水还在木坪滴答。

国庆节放假。我老家在涪陵,交通不便,我就住在陈老师家里。他带我去坡上背苞谷。我个矮,背篓绳子勒肩,走半里就喘。他把我的背篓卸下来,自己加上一筐,重量压进脚背,鞋带“啪”地一声崩断。

“教书跟种地一个理,先弯腰,再抬头。”

那天,他教我捆苞谷秆:要留一个活扣,一扯就散,牛吃也方便。我手笨,捆成死疙瘩,他抽刀割断,让我重捆,刀锋贴着我拇指过去,凉飕飕的。我吓出一身汗,他却咧嘴笑道:“刀不吓人,人才吓人。”

冬天围炉烤红薯。火塘里柴火爆出“噼啪”声,他忽然问我:“你怕啥?”

我愣住,半天说:“怕教不好,误人子弟。”

他用火钳敲敲鞋底:“我小学毕业,最后读了个师训班,也误了40年。误着误着,就把娃误出山了。”

他抬了抬下巴,指门外那条山溪:“山里的河像粉笔,雨一年削一截,可还是能把娃们驮到山外。”

接着,他拿起老烟杆抽起了烟,火光映红了半边脸,皱纹像山路的弯,一道一道,里面藏着风。

2009年,陈老师退休,而我依然在木坪小学守望,他只要路过学校都会来看我。2016年我从木坪调到黄鹤小学,那天早上雾大,他送我到垭口。我背包里塞满了他送的腊肉,沉甸甸的,像背着一块大石头。

“走吧,别回头。”

我走了,走到转弯处,还是忍不住回头:雾已吞掉木坪,只剩下他吸烟的火星忽明忽暗,就像夜里的一颗星。

这些年,我们时不时都在联系。每年,陈老师都会托人或者亲自来看我,给我带上他自制的腊肉或自养的蜂蜜。

今年,我邀请明廷卓陪我回去,驾车到了木坪小学,发现学校已被村委占用,教室改成了储藏室。门口那片梨子林还在,树皮上刻

满“正”字,是他当年给学生记的出勤。

我仿佛看见他仍坐在教室门槛上,拿一根树枝,还在写“高粱”,只是手抖,梁字下面的“米”少了一点。一群放学的娃围着看,笑他写错了。他也笑,露出那排黑牙。

“错就错,明年再来。”

然后,我们驱车到他家,只见他拿着木板在打蜂桶边上的大马蜂,见我下车,眉头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,眼里满是惊喜:“小余,你们进屋坐?”师母端茶出来,笑道:“刚才,他还在念叨‘喜鹊叫,有客到’,没想到这客人居然是你们。”

进屋后,我们拉拉家常,看着陈老师稀疏的银发,听着他沙哑却依旧有力的谈吐和爽朗的笑声,我知道他这段时间过得很舒坦。

傍晚辞别时,他坚持送我到车边。引擎刚发出低低的轰鸣,他忽然弯下腰,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布包。粗布已被摩挲得起毛,他一层层慢慢揭开,里头裹着的,竟是一截粉笔头——也许是放久了,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胀,边缘都成了灰扑扑的疙瘩,只剩中间一点白还顽固地亮着。

“带着,忘词了就写,粉笔短,河很长……”

车窗缓缓升起,他的身影在玻璃上慢慢缩成一小团,蓝布衫被晚风吹得鼓起来。车子拐过山嘴时,那抹蓝只剩一个模糊的点,像从重重山缝里漏出来的一小片天。

木坪没给陈老师立碑。

可我清楚,那些被他教过的娃,如今散落在天南地北。有的坐在窗明几净的银行里敲击键盘;有的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挥洒汗水;有的也像我这般,仍握着粉笔站在讲台前;也有的没走出大山,留在村里,成了穿梭林间的养蜂人或守护绿意的护林员。他们每写下一个字,袖口总会沾上一粒粉笔灰,走在路上带起风,那灰便跟着飘向更远的地方。

山从不会刻意记住谁,字也不会特意刻下谁的名姓,只是每写一个字,袖口就沾上一粒灰,走路带风,灰便跟着落到更远的地方——像风把灰带走,不声张,也不回头。

## 如果我重返讲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艾晓林

我又梦见巴县九中。依旧是那黑瓦土墙木楼的教学楼、办公楼、教师宿舍、学生寝室,还有伙食团,小溪环绕的操场,石桥头两棵黄葛树依旧生机勃勃。校园里飘着高大的香樟树散发的浓香。

我又梦见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,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,让我洋溢着青春的激情。

不只是巴县九中,我还一次次梦回巴县中学。在熟悉的教室里,一张张熟悉的脸依旧生动而亲切。

一次次梦醒,总会让我回忆起那些难忘的校园往事,那些平常而又温馨的日子,心中更升起无限怀念。

梦醒后,我突然想:如果再站上讲台,我会是什么样子。

我曾在中学校园里工作过19年。刚开始教学时,缺乏教学经验,仅凭年轻人的热情,将所学的知识,用传统的讲授方式上课。后来,我运用启

发式教学,注重“授人以渔”,教给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,增长语文知识,体验阅读和写作的乐趣。

巴县中学给了我广阔的舞台。在教学中,我构建了“自学、导学、研讨、自得”的课堂教学模式,以及导读、自学、阅读、欣赏、表演、辩论六种课型和课堂作文“八步骤法”。将全班同学分成小组,把课本中的小说、戏剧编写成20分钟左右的课本剧,自编自导,在课堂上演出。我坚持让学生每周写一篇500字左右的练笔文字,作为课外写作活动,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。学生的练笔结集《太阳雨》出版,至今仍是他们校园生活最美好的记忆。我组织成立巴县中学“巴人文学社”,编辑出版社报《巴人风》,丰富学生课外阅读写作活动,成为全市语文教学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20多年过去,那些美好的记忆,是我梦中美丽的故事。

多年来,每忆及校园往事,我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失而自愧,甚至自责:我是不是影响和耽误了学生的前程?

如果重返讲台,我相信,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

如果我还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在完成一篇课文的教学任务后,一定要讲对文章的鉴赏,告诉他们:散文美在哪里;小说的形象是通过哪些生动的细节描写和情节推动塑造出来的;说明文是如何把事物说明白的;议论文是怎样将事理一层层论述透彻的;诗歌的意境是如何用一个具象和形象来营建的。倘能如此,学生们是不是对文章有更深刻的理解,更有收获呢?

如果我还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一定会努力学习教学课件制作技术,精心设计每堂课课件并熟练运用在教学中,让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直观地学习。如果有作家的影像,一定放给学

生观看,让学生对他们的了解更丰富。如果是有影视片的小说或戏剧,可以放精彩片段。每一篇散文和每一首诗词,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,可以通过多媒体把故事和情景生动地再现出来。而科技说明文,则可以用AI技术生成具体的形象展示出来。这样的课堂,一定会深受学生的喜爱。

如果让我重做语文老师,每一次作文,我都会写出一篇同题作文,让学生们点评。也许这样,我们都能更快地进步,学生的写作热情也会更高。

我读小学时,赵炳昌老师说他读私塾时写文章,开篇总是:呜呼哀哉,时光如白驹过隙。后来,他却告诉我们,作文要有新意。

我已退休两年,我知道不可能再重返讲台。今天写下这篇文字,写下“如果我重返讲台”的一些想法,是想写出我的遗憾,表达对我的学生的歉意,更想表达我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、幸福和温暖,还有深深的感谢。